

董锡玖：舞蹈交流的民间使者

范舟

浙江音乐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 本文对董锡玖在舞蹈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作出回溯与总结。一方面，她对敦煌乐舞文化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历史书写、舞蹈创作与舞谱研究等方面。另一方面，她在中日舞蹈的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日本舞蹈的介绍，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舞蹈界带来国外舞蹈的信息，填补知识的空白；（2）以比较研究为方法，以他者为参照系，对中国舞蹈自身的特征与历史，进行反身观察；（3）将中国舞蹈定位于世界的整体时空，讨论中国舞蹈对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影响，其实是对中国舞蹈价值的高度认可与话语提升。

关 键 词： 董锡玖；敦煌文化传播；中日舞蹈交流

Dong Xijiu: The folk Messenger of Dance Exchange

Fan Zhou

Zhejia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Hangzhou, Zhejiang 310000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Dong Xijiu's contribution in the history of dance culture exchange. On the one hand, sh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Dunhuang music and dance culture, mainly in the aspects of historical writing, dance creation and dance score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sh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xchange of dan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Introducing Japanese dance, bringing foreign dance information to the Chinese dance circl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filling the gap in knowledge; (2) To observ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y of Chinese dance in a reflexive way with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study and the other as the frame of reference; (3) Positioning Chinese dance in the overall space and time of the world and discuss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dance on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is actually a high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Chinese dance and the promotion of discourse.

Keywords： Dong xijiu; Dunhuang culture dissemination; China-japan dance exchange

对于舞蹈界的人来说，董锡玖的名字赫然响亮。1956年10月，“中国舞蹈史研究小组”成立，吴晓邦任组长、欧阳予倩为艺术指导，她是四位成员之一。1974年，她因修订《辞海》舞蹈条目被调入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担任音乐舞蹈研究室舞蹈研究组组长。^[1]1980年5月，独立的舞蹈研究所正式成立，邀请吴晓邦他出任所长，许多实质性的工作则由董锡玖处理。1981年，她着手创办研究院研究生部的舞蹈系并担任第一任系主任，请吴晓邦担任硕导，为中国的舞蹈事业培养起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凡此种种，她足以为后来的舞蹈工作者所铭记。

一、出文入舞：从“北大民间歌舞社”到“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

1925年2月10日，董锡玖出生于山东济南，祖父殿魁是清代的拔贡，父亲董莲峰是胶济铁路警务段段长，母亲薛真是青岛薛家岛人。董锡玖出生时，伯伯们已经生有八个女孩，她在大家族中排行第九，取名“玖”，此字也意为黑色似玉的石头。1944年，年轻的她考入北京大学，起初是日语系，一年后转入中国语言文学系，后来又加修北大图书馆专修科课程。1949年6月，董锡玖

于中文系和图书馆专修科同时毕业。

她是如何进入舞蹈的世界的呢？

抗战时期，在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人的带领下，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分别从北京和天津迁出，落脚云南昆明，合为“西南联大”，成为战时保存中国学术与科研力量的重大阵地，培养了一大批富有爱国热情的优秀青年。1945年，中国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三校返北，北平再次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心。同时期，戴爱莲于1946年在重庆开展“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在青年学生群体中掀起了边疆舞的热潮。如此，

项目资助：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日舞蹈交流史研究”（项目编号20YJC760018）阶段性成果。本文为浙江省第一批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中国舞蹈史》建设成果。

作者简介：范舟，浙江音乐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舞蹈史、中日舞蹈交流史等。

在时代洪流和边疆舞热潮的双重背景下，“北大民间歌舞社”应运而生。^[2]

北大民间歌舞社出现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董锡玖被裹挟进了这样的时代。如果说参加这一社团让董锡玖摸索到了舞蹈的边缘，那么与戴爱莲的结识，则真正让她进入了中国舞蹈的核心领域。

1948年2月，叶浅予受徐悲鸿的邀请，前往北平艺专任教，戴爱莲随之来到北平。董锡玖第一次见到戴先生，是在1948年“北大民间歌舞社”成立一周年之际的庆祝演出上，这次演出的许多节目都是彭松参与排练的。在中法大学礼堂演出时，董锡玖第一次见到了慕名已久的戴爱莲。^[3]

之后，戴先生于1948年7月暑假，在北平艺专礼堂开办了舞蹈班，再度引起了包括董锡玖在内的北京大、中学生的学舞热情，这深深影响到了董锡玖未来的人生。1949年1月30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伴随着革命热情的高涨，中国需要培养大批青年文艺工作者。当时，戴爱莲出任华北大学三部舞蹈队队长，董锡玖随即向北京大学团组织提出申请，毕业之后不参加分配，希望到华大三部舞蹈队去。当年7月，她进入华大三部舞蹈队，成为舞蹈演员，又于10月2日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人民胜利万岁》大歌舞的演出。^[4]1950年，华大三部舞蹈队改组为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董锡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就是新中国第一部舞剧《和平鸽》的创作和演出。

1952年，在经历了北大民间歌舞社、戴爱莲舞蹈班、华大三部舞蹈队、中央戏剧学院舞蹈队的岁月洗礼之后，董锡玖也已经从习文转向了习舞。而后，她又迎来了一个更为重大的人生转折——成为欧阳予倩的秘书。

这是1952年4月23日，她提着简单的行李，来到铁狮子胡同三号的欧阳院长办公室报到，也就是他的家。欧阳予倩曾为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讲授过一次“中国舞蹈史”，并且还排演了《和平鸽》，因此，董锡玖对他并不陌生。当时，欧阳院长已经63岁，却仍然穿西装、带领结，仪表堂堂。见到董锡玖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她会不会外语。董锡玖说，会一点日语。他又问，英语如何？回答说，学过一点。他道：“日语一定要好好继续学下去，我的日本朋友多，你可以翻译些短小的东西，我帮你校。”自此，董锡玖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秘书工作，直到1962年9月，欧阳院长驾鹤西去。

离开舞蹈团，担任欧阳予倩的秘书，并不意味着董锡玖离开了她热爱的舞蹈事业，或许是受到了欧阳老的影响，她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重心逐渐转移到舞蹈史的研究与舞蹈学科的建设上去。1962年春天，这是董锡玖担任欧阳院长秘书的第十个年头，当时，欧阳院长已经因为心脏病而住进了阜外医院。应董锡玖的要求，他为董锡玖写下了一段予以勉励的话，并且配以小诗：十年共事，祝我良多。马列经典，共同切磋。艺术史论，取精用宏。积以时日，宜获大成。

二、走遍丝路：让敦煌乐舞闪耀出中华文化的璀璨

刘峻骧称董锡玖是舞蹈史学界唯一走过东西丝绸之路的学者，也是第一批考察丝绸之路乐舞的学者。关于这番经历，笔者

将从历史书写、舞蹈创作与舞谱研究这三个方面，对董锡玖的贡献进行简要论述。

其一，董锡玖是注重历史研究的一手材料的，她从考察敦煌莫高窟开始，足迹逐渐踏遍全国的石窟寺，收集了大量有关舞蹈的文字和形象资料。同时，她也重视实地考察并收集活态流传在民间的舞蹈资料，由此，作为中国舞蹈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她的史学研究充盈着真实可感的形象资料，用实际行动驳斥着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认知。

董锡玖是1974年被调入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担任舞蹈研究组组长的，此后她便开始着手进行田野考察的组织工作，并于1977年组成了一个由董锡玖、刘恩伯、吴曼英、李才秀、陆文鉴组成的五人考察组，从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开始，经过延安、嘉峪关、兰州、敦煌、安西等地，走上开发大西北的征程，作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考察。当年七月，她们抵达向往已久的莫高窟，站在九层楼前，董锡玖抬头仰望，心中满是崇敬。每天清晨，四周一片安静，只有太阳缓缓升起，将充足的光线洒入窟内。趁着阳光，考察组每天8点开始上洞，将壁画、雕塑看得很是清晰。敦煌文物研究所安排史苇湘老师带领考察组上洞并为之讲解，这对于此次考察是极为重要的。董锡玖对于这次考察的回忆令人感受到那种强烈的震撼，千姿百态的飞天、矫健婀娜的经变画菩萨、粗犷雄浑的金刚力士、极富想象力的乐器自鸣、充满地方色彩的世俗画，这些都让原本只处于书斋之中的她感到陶醉，让她触碰到真实的远方气息。

刘峻骧对此次考察的评价极高，并总结了三大意义：其一，它是舞蹈学者第一次集体的、大规模、高层次的对丝绸之路上的乐舞，特别是敦煌壁画彩塑中舞蹈的考察。其二，开拓了中国舞蹈创作和舞蹈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其三，造就了人才，为舞蹈文物考古学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如刘峻骧所说，这次丝路之行在中国舞蹈的研究路径、人才培养、舞蹈创作、史学书写等诸多维度产生了奠基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董锡玖个人的历史研究中，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了一种实证性、形象性的书写倾向，重视壁画、图像、雕塑等出土文物的历史信息。比如在描述北魏、西魏、唐代、元代等诸多历史时期的舞蹈之时，她对对应时期的壁画乐舞形态作为例证，因为莫高窟本身就是中国乐舞发展中时间流淌与文化重叠的纵横交错。比如她专门写有《乐舞文物》一文，描述了陶器、青铜器、玉器、贾湖骨笛、河姆渡冠纹巫舞玉饰、三星堆铜面具、云南开化铜鼓主晕图、《韩熙载夜宴图》、南宋杂剧图、金代乐舞石刻、西夏王陵妙音鸟等存留着乐舞印记的图像与器物。又如，她撰写了《弹弓背上的乐舞百戏图》《西藏寺院的乐舞》《辽庆州白塔的乐舞》等诸多专题文章。再如，她与刘峻骧共同编写了《中国舞蹈艺术史图鉴》，在以正史为主要舞蹈史建构材料的研究倾向之外，开辟了一条以图证史、以物证史的路径。冯其庸说：“锡玖同志的研究，首先是从实地调查入手的，这一点太使我赞赏了。”^[5]今天，我们对此习以为常；当时，一切皆非理所当然。

敦煌对于董锡玖的吸引力是巨大的，第一次“敦煌行”之后，她又多次亲赴那里，并且沿着“丝绸之路”进行实地考察，比如甘肃的炳灵寺、天水的麦积山、乌鲁木齐的柏兹克里克、库车的斯木塞木和库木吐拉、拜城的克孜尔，还有云南剑川、山西大同、河南洛阳龙门、巩县等。^[6]

其二，是关于舞蹈创作的，虽然不是董锡玖本人的创作，但是无疑，她对于《丝路花雨》等作品的出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977年夏天的考察转瞬即逝，离开前，按照敦煌不成文的规矩，他们要做一个工作汇报。于是，董锡玖负责文字，陆文鉴做男性舞蹈动作，李才秀做女性舞蹈动作，并展示吴曼英的123幅敦煌舞姿线描图。专家们听得津津有味，面露喜色。在兰州，他们又向省委宣传部做了汇报，这次见到了省委宣传部吴坚部长。当时，常书鸿先生正陪杨振宁在兰州，也赶来听汇报。在汇报的结尾，董锡玖一行大着胆子，向甘肃省委宣传部提出：“敦煌在甘肃，为什么不把敦煌艺术搬上舞台？”吴坚和陈舜瑶两位部长立刻说：“我们搞一个。”没过几天就下达了搞一个敦煌舞蹈节目的指示，给甘肃省舞蹈团。^[7]这就是此后轰动世界的《丝路花雨》的源头。

1979年，《丝路花雨》诞生了。当年7月，董锡玖与画家赵世瑛同行，再次进入莫高窟的洞窟学习。吴坚部长又请董锡玖联系北京的专家来观摩《丝路花雨》，邀请了吴晓邦、盛婕、沈从文、张兆和、张肖虎、阴法鲁、彭松、叶宁、李承祥、王克芬、刘恩伯、傅兆先、潘志涛等人赴兰州。此后，敦煌乐舞的影响力在中国逐渐蔓延开来，高金荣的敦煌舞教材也在此氛围中生长出来。可以说，将敦煌乐舞的魅力拉进当代人的视野，董锡玖先生功不可没。

其三，是关于敦煌舞谱的研究，这里就不仅仅涉及她向西行走的经历了，还囊括了她与东邻日本学者的交往。

1900年，敦煌舞谱残卷展露于世人眼前，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伯希和与斯坦因将大量残卷带去法国与英国。在中国，任半塘、饶宗颐、罗庸、叶玉华、柴剑虹等学者先后加入研究的队列，日本则有林谦三、水原渭江等学者对此做出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林谦三就曾将自己对于敦煌舞谱的研究文稿寄给中国的欧阳予倩和阴法鲁等学者，开通了两国相关学术研究的对话通道。至80年代，水原渭江在访问北京大学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时，将《法京所藏敦煌发现舞谱〈南乡子〉解读》等数篇论文交给他，随后又经由董锡玖在北大时的老师阴法鲁之手，转交到了董锡玖的手上。很快，她邀请友人柳春与自己的儿子朱近以及刘庆池、王立贤两位先生，一同将其翻译出来，以供研究所的同志们阅读。

1983年，董锡玖赴日本展开为期一年多的访学，其中也去到水原渭江的住所进行当面拜访。1985年，水原渭江在日本出版著作《敦煌舞谱的解读研究》，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基于斯坦因的相关资料，下册是基于伯希和的相关资料。除了作者自序之外，书中有两篇序言，均为中国人撰写，一篇是饶宗颐的，一篇就是董锡玖的，后者写于1984年10月，在东京新宿。^[8]水原渭江也在论文中提及了这段往事：“这些论文的单行本，在伯希和少数门生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教授的北大寓所中，亲手交给了他。王力教授又转给了舞蹈研究所，委托专家研究讨论。（中略）舞蹈研究所副所长董锡玖女士着手翻译了我的论文。一个月后，我再次访问中国，赠送了其后的数篇论文，也很快地翻译出来，在舞蹈研究所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因国际交流基金而访日的董锡玖女士，一到日本马上访问我的寓所，请校阅译出的数篇草稿。”^[9]

除了充当交流的桥梁，董锡玖自身也凭借着她的跨文化视野，对敦煌舞谱的解读做出了自己的阐释。敦煌舞谱是文字谱，包括了“令”“舞”“授”“摇”“寄”“约”“拽”“头”“揖”“送”“请”

等关于动作描述的词汇，也正因此，穿越了千年的语汇与语境的差异，导致我们对其的解读产生了困惑。董锡玖对于“寄”的解读就参考了日本雅乐“左舞”的舞谱，因为“左舞”的构成主要是中国传入的乐舞。在“左舞”中，“左寄”指的是左脚擦地向左，右脚向左脚靠拢这一动作，董锡玖认为这可以作为敦煌舞谱解读的一种参考。

敦煌舞谱是其一，此外董锡玖还对纳西族象形文字“东巴舞谱”，以及蒙藏乐舞交流的见证“羌姆、查玛舞谱”等作了详细讨论。舞谱含括了舞蹈演绎的思维特征，凝缩了舞蹈传承的时间宽度，也放射着舞蹈生成的文化概览，这与董锡玖对于形象可感的历史真实的追求是相呼应的。

走遍丝路，她唤起历史的交流记忆，将这份重叠着时间痕迹与文化烟火的珍贵留存，带入当代研究者的真实视野；走遍丝路，她驻足于敦煌莫高窟前，仰望那千姿百态的伎乐形态，在历史研究与舞蹈创作的双向轨道上推动了“敦煌舞”的前行；走遍丝路，她深入舞谱的解读，期待转瞬即逝的舞蹈能够保留下岁月的宽度。

三、中日交流：搭建双向沟通的友谊之桥

如果说，从1977年开始丝路考察之行是向西追忆古代乐舞的交流印记，并以一手材料为书写基础，展开一段动人可感的历史言说，那么，从1980年开始的东访之行，则将董锡玖的交流视野进一步推向国际，对中日两国舞蹈信息的交互传播与中国舞蹈史研究视野的扩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80年11月，董锡玖第一次访问日本，是作为文学艺术研究院代表团的一员，由白鹰担任团长，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观摩和考察。除了观摩日本的流派舞蹈、雅乐、能等传统表演艺术之外，董锡玖还见到了中国舞蹈界的老朋友松山树子和清水正夫。临别时，清水正夫一再叮嘱，要向中国的老朋友们带去问候。周巍峙、吴晓邦、戴爱莲、陈锦清、盛婕等同志，就是他们的老朋友。

最为重要的一次访日是1983年6月17日至1984年10月16日，董锡玖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并受到中国文化部的派遣，到日本进行为期一年零四个月的访问与考察。这一次，她更加广泛的了解和掌握日本舞蹈的理论与演出，结交日本友人，同时也将中国舞蹈介绍给日本朋友。在观摩演出方面，她不仅对能乐、雅乐、歌舞伎、各个流派的日本舞蹈等传统艺术进行了解与学习，也关注日本神乐、田乐等更具有民俗气质的表演形式，以及日本的芭蕾舞、现代舞、流行舞等发展情况。在实践体验方面，她师从日本舞蹈研究的专家郡司正胜，对日本舞蹈的历史，尤其是歌舞伎，有了更为细致的了解。同时，她还跟随花柳千代先生，学习“花柳流”的舞蹈演出方式。在友好交流方面，她不仅结识了上述师长，还与英二三枝子、葵妖子等日本的现代舞蹈家成为挚友，促进了中日舞蹈与艺术的深入交流。

此间，董锡玖还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为甘肃省歌舞剧院《丝路花雨》的赴日演出做了宣传工作。在中国，《丝路花雨》的出现引发了对于古代乐舞的文化关心与复兴热情，在海外，《丝路花雨》应接不暇地收到演出的邀请，先后在法国、意大利、苏联、日本、泰国、朝鲜等国进行演出，轰动一时。在1984年1月至3月，舞剧赴日本进行了为期52天的巡演。当年3月，日本新闻

社记者来到她位于东京目白的家中进行采访,为《丝路花雨》在东京的演出做更为广泛的宣传和普及。

在这为期一年零四个月的访日之行之后,董锡玖满载而归,欧建平在《心绪平和 精神年轻》一文中对其价值做了详细的描述,笔者总结如下:①拜名师、广交友;②广泛学习与观摩;③梳理中日舞蹈交流的历史;④为中国舞蹈史的研究提供参照系;⑤买回了打印机与大量日文书,为研究院提供了务实的便利;⑥回国后发表论文、出版著作;⑦影响其指导硕士(金秋)的方向;⑧促成与花柳千代的姊妹关系,极大推动了中日两国舞蹈工作者和广大民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⑨将日本“无形文化财”和“人间国宝”的文化保护体制介绍回中国,为中国的“非遗”保护推波助澜。欧建平说:

“这一切,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当中国刚刚打开国门,而我们对国外舞蹈知之甚少,真可谓让人顿开茅塞,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新人来说,更是弥足珍贵!”^[10]

董锡玖回国后,两国舞蹈家的往来并没有从此中断。1985年5月31日至6月7日,花柳千代与芙二三枝子应舞研所的邀请进行了首次访华旅程,在董锡玖等人的陪同下,她们来到敦煌、西安、南京、上海考察,中华文化的灿烂光辉以切近的距离与直观的感知,呈现在日本友人的面前。从此,花柳千代始终与中国舞蹈界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于多年后的1992年被中国艺术研究院聘为“荣誉研究员”,又于1994年根据敦煌156窟的《张议潮收复河西出行图》和《宋国夫人出行图》为灵感创作了舞剧《大敦煌》。戏曲学家周育德称:“敦煌艺术宝库启发了艺术家的灵感,日本舞蹈家按照自己的理解创作了《大敦煌》。(中略)突出了反对战争与残杀,祈祷永世和平的主题”,此外,他还对这一将中国京剧与日本舞蹈进行“嫁接”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肯定。^[11]

1986年1月9日,董锡玖再渡赴日,这次是与吴晓邦、盛婕一同前往,他们受到日本埼玉县舞蹈协会会长藤井公先生的邀请,参加1月9日至21日之间进行的“埼玉县国际舞蹈比赛”,吴晓邦任评委,盛婕与董锡玖任观察员。此后,董锡玖又先后于1988、1993、1996、1997年,应日本民主音乐协会以及日本埼玉县现代舞蹈协会的邀请,担任国际舞蹈比赛的评委,并推荐中国选手参赛。除了1986年与吴晓邦一同率领《鸣凤之死》之外,还比如有卓玛与马跃的《禅心》也获得了比赛的特别奖。

交流是双向互动的有来有往,在董锡玖出访日本的同时,日本友人们也先后访问中国,中日两国的舞蹈与文化在相互交叉的时空隧道中不断照面、静水深流,留下了郡司正胜、花柳千代、水原渭江、芙二三枝子、葵妖子、清水正夫、松山树子、岸边成雄、宫尾慈良、清水哲太郎、森下洋子、藤井公、田边秀雄等一系列名字。

董锡玖对于中日舞蹈交流的贡献,不仅在于两国信息的互通有无与交互传播,还在于在她对于中国舞蹈史的研究中,注入了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她期待的文化交流现象,也是她治学的方法和态度。

其一,董锡玖对日本舞蹈的介绍,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舞蹈界带来国外舞蹈的信息,填补知识的空白。她撰写了《日本舞蹈漫话》《扶桑寻舞记——访日归来》《重温中日乐舞交流史——访日心得》等文,翻译了郡司正胜的《日本近现代舞蹈》,为中国学者了解日本舞蹈的概况提供了简洁的知识窗口。

其二,董锡玖以比较研究为方法,以他者为参照系,对中国

舞蹈自身的特征与历史,进行反身观察。在她看来,舞蹈史的研究需要掌握文献资料、社会调查、横向研究、比较研究方法。在比较研究方法中,她更进一步地列举了三种比较研究,即纵向比较研究、横向比较研究、形式比较研究与思想内容比较研究。比如,她对比中日两国舞蹈的手势,认为中国常用兰花指,日本则五指并拢,仅有大拇指稍屈,这背后是中国阴阳五行的哲学观与日本崇尚忠义的思想之间的差异。

其三,董锡玖将中国舞蹈定位于世界的整体时空,讨论中国舞蹈对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影响,其实是对中国舞蹈价值的高度认可与话语提升。在论述中国舞蹈史的唐代部分,她屡屡提及大唐乐舞的世界影响力,尤其以东邻日本为最为重要的文化接纳地。由此,她对唐舞总是带着强烈的兴趣与热情。一方面,这可能来自于欧阳予倩对她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也来自于董锡玖对于唐乐舞的高度认可与文化自信。基于这种认可和自信,她也表达了对于唐舞研究者刘凤学的敬重。她们是曾经在“戴爱莲舞蹈班”的同学,从60年代开始,刘凤学就潜心研究唐舞,多次赴日本、韩国等地考察诸多中国唐代与宋代传播过去的乐舞,如《春莺啭》《兰陵王》《威加海内》等。董锡玖形容彼此是殊途同归的,在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她们都在为了弘扬华夏文化而辛勤耕耘。

当然,日本不是董锡玖出访的唯一目的地,除日本之外,她还先后赴苏联、澳大利亚、韩国、美国等地考察舞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中国舞蹈界的对外交流与眼界开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走遍天涯海角,中国的土壤是她的落地之地。实地调查、书写历史、国际访问,最终导向的是她对过去的依恋,对现在的热忱,对未来的憧憬,这些都是关于中国的。

参考文献

- [1]刘峻疆,《三仁学长,四端舞人——读董锡玖〈缤纷舞蹈文化之路〉有感》,收录于《缤纷舞蹈文化之路——董锡玖舞蹈史论集》,第4页。
- [2]董锡玖:《北大民间歌舞社——我的舞蹈摇篮》,收录于《缤纷舞蹈文化之路——董锡玖舞蹈史论集》,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
- [3]董锡玖:《戴爱莲舞蹈班》,收录于《缤纷舞蹈文化之路——董锡玖舞蹈史论集》,第130-131页。
- [4]董锡玖:《〈人民胜利万岁〉响彻中南海——开国大典演出回忆》,收录于《缤纷舞蹈文化之路——董锡玖舞蹈史论集》,第132-134页。
- [5]冯其庸:《序——读董锡玖〈缤纷舞蹈文化之路〉书感》,收录于《缤纷舞蹈文化之路——董锡玖舞蹈史论集》,第1页。
- [6]朱盼盼、熊佳琪,《不惑之年的感恩与缅怀——访董锡玖先生之女朱盼盼》,《舞蹈》,2023年01期,第64页。
- [7]董锡玖:《敦煌缘》,收录于《缤纷舞蹈文化之路——董锡玖舞蹈史论集》,第187页。
- [8][日]水原渭江,《敦煌舞谱解读的研究敦煌舞譜解説の研究——ste in関係資料——》,朋友书店出版,1985年。
- [9][日]水原渭江著,席臻贯译:《中国学术界在敦煌舞谱解读研究方面的最近动向》,《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第127-128页。
- [10]欧建平:《心绪平和 精神年轻——为董锡玖老师80华诞而作》,收录于《缤纷舞蹈文化之路——董锡玖舞蹈史论集》,第24页。
- [11]周育德:《中国京剧与日本舞蹈的“嫁接”》,《中国京剧》,1995年05期,第55页。